



第三卷

太白文艺出版社

李星文集

第三卷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录

第五辑 小说天空

- 读雷达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 3
- 升华了的历史精神和飞扬的道德激情 12
——读杨志军的《藏獒》
- 对历史理性精神的强烈呼唤 16
——序汤吉夫的《大学纪事》
- 汤吉夫和他的教授小说 21
——致汤吉夫
- 现代化语境下的西部生存情境 24
——从《大漠祭》到《猎原》
- 以什么姿态来记忆? 31
——读《定西孤儿院纪事》
- 裸露的权力现实和欲望心灵 36
——评陈行之《危险的移动》
- 一个民间写作者的叛逆姿态 43
——读老村的《骚土》(足本)
- 瞄准真实而健全的人 48
——读白描的《苍凉青春》

- 51 《古船》试论
——致张炜
- 60 人的长吟
——谈《秋天的愤怒》及其批评
- 65 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心理的批判性审视
——评施亮长篇小说《黑色念珠》
- 71 谜一样的艺术精灵
——王安忆小论
- 77 大山的沟回
——阿城中篇小说试论
- 83 论张宇小说的农民精神文化现象
- 94 病态社会心理的一面镜子
——评金河的短篇小说
- 97 关于唐栋小说创作的通信
- 105 传记文学的重要收获
——读《群山》致忽培元
- 109 怀旧与招魂
——读台湾乡土小说代表作《梅村心曲》
- 119 农民命运的艺术思考
——谈高晓声的四篇小说
- 125 一个独特的艺术天地
——多杰才旦小说印象
- 134 评陶正的《田园交响曲》
- 147 谈《游戏》的游戏意味
- 152 从《游戏》到《真迹》
——致成一
- 156 赤心热肠谈《旧址》
- 159 杨争光其人其文
- 166 对精神太阳的渴盼
- 174 市井女性的世俗风采
——读池莉《生活秀》
- 176 命运和它的影子
- 178 私人生活构成的“宏大叙事”
——评韩天航《我的大爷》

刘晓刚小说二题	181
奔向创造力的辉煌	186
——马安信及其叙事诗创作一谈	
读小说随笔(一)	189
读小说随笔(二)	200
2007年的十本小说	216
——为《中国图书商报》推荐	

第六辑：自抒胸臆

我的优胜纪略	221
我的田野,我的槐树	225
怀念喜儿	229
三个不成故事的故事	234
我在地球另一面的行走	236
从上海到杭州	246
——我的一九六六	
往事新忆(二则)	255
十三岁时的《保卫延安》	260
忆淡泊老师	262
影响了我一生的四本书	269
在困难的日子里	271
——我的中学时代	
我的第一篇退稿	275
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277
——五十周岁感怀	
重构一个陈忠实	280
回忆,从八月六日开始	288
——关于路遥的回忆	
忠诚的农民的儿子	292
——邹志安十周年祭	
难忘那张温暖亲切的笑脸	296
——怀念赵常安先生	

- 299 人类命运的象征(外一则)
- 303 也谈所谓“炒陕军进京”
- 306 话语欲望、话语霸权和话语膨胀
- 308 飞禽走兽之辩
——关于批评的断想
- 314 关于西部的情思
- 317 “假中见真”和“真中见假”
- 319 一句定音
- 321 速朽的文字
——《读书漫笔》后记
- 323 我和我的文学批评
- 325 行业文艺的兴起和行业题材创作的意义
- 329 文学化的哲学反思
- 331 孤独:一个永恒的话题
- 333 张艺谋:《黄金甲》之前和之后
- 335 有气“无文”的赵发元
- 337 狗尾续貂
——在一次文学会议上的现场评点
- 339 天涯何处无芳草
——李天芳其人其作
- 343 “善心结出的善果”
——苏闻其人其文印象
- 347 一枝一叶总关情
——薛保勤其人其作
- 349 我的朋友张文远
- 352 文扬正气净俗尘
——茹桂教授印象
- 356 认识一个新的丁祖诒(外一则)
- 360 清洁的声音
- 363 一个职业女性的心灵和人生
- 366 导游小薛

怀念世界杯的日子	368
古城渔夫(小说)	370
七婶(小说)	376
刘氏兄弟(小说)	379
我的音乐体验	382
秦腔,给了我生命的熏陶(访谈)	384
代后记:再谈我和我的文学批评	387

第五辑：小说天空

读雷达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

“如果说,新的天才向世界揭示了艺术中的新领域,把占统治地位的批评抛在自己后面,从而给它以致命的打击,那么,在批评中所实现的思想演变,照样也超越和摧毁旧的艺术,为新的艺术做好准备。”^①别林斯基这段话,正确地阐明了创作和评论相得益彰的辩证关系。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和评论就是这样互相促进的,不仅出了一批开拓艺术新领域的作品、作家,也出现了一些为新的艺术做准备的文艺批评家,雷达就是其中的一个。正是在新时期小说创作新突破的感召下,在短短的几年中,他就写了30余万言的评论文字。这些文章大多是对当前小说创作新成果的评介、研究,并努力从其中找出某些规律性的经验,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有一定的理论升腾力,记录了评论家在新形势下探索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丰硕成果。

—

坚持和捍卫文学的真实性原则,提倡作家正视现实,反映人民的爱和憎、反映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这是雷达对作品进行历史的批评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他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审美观的一个主要方面。

早在1978年初,在为《班主任》《窗口》等作品所写的评论中,雷达就说过这样的话:“敢于大胆地‘看取人生’,写出人民群众的爱与恨,喷射着人民感情的炽热岩浆,回荡着时代精神的有力旋律。这是艺术作品的生命,这是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感情基础。”^②在1982年他又撰文称赞那些“有一股真实的力量,不粉饰,不回避,不矫揉造作,敢于大胆地、深入地直面生活,看取人生”^③的作品。



他说：“近年来，在小说创作的成功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不可回避历史、不可回避现实，首先必须做到敢于真实地、历史地再现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④

如果仅从字面上看，或许很难说雷达将什么新的概念带进现实主义小说理论中。然而，衡量一种理论的意义，不能只看它创造了什么新的概念，而在许多时候，却要看它在实践中的应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新的解释。如果在新的条件下，强调的正是这种理论的战斗锋芒，并且不断开拓着它实践的范围，那么就不应该认为这仅仅是因袭，而应该认为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创造。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原则，早就存在于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中，但是在我国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运动中，人们常常只强调它的某一面，而否定它的另一面，实际上，是阉割了它正视现实、不回避现实矛盾的战斗锋芒，使现实主义理论成了一种残缺的、跛足的理论。近些年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中国的文学越来越获得了现实主义的真正品格，达到了与时代、与人民、与实际生活日益密切的结合，中国的文艺批评，也同时实现了自己的思想演进，有了真正现实主义的文艺批评。雷达就是在对新时期社会生活现状、文学现状的研究中，不断磨砺着现实主义理论的战斗锋芒，摧毁旧的艺术、呼唤新的艺术的。

“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来说，真实性是基础和核心，它既是最起码的要求，同时又是最高的要求。”⑤只要是真实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生活的作品，它的生命力就是顽强的，任何外力也不能将它从人们的心目中打倒。但是并不到此为止，他同时对生活真实性和艺术真实从理论上进行着小心翼翼的界说和探讨。从列宁关于“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⑥的论述出发，他认为真实性本身也有高低之分、表层和深层之别，而现实主义艺术真实则要求作家不断向生活深处探索，触摸到社会生活的本质精神和脉搏跳动。同时他又将艺术真实和真实地揭示社会矛盾联系起来，提出“只有建筑在真实的社会矛盾的基础上，才会有生命力”⑦，“真正的现实主义是一定要面对重大的现实矛盾作出回答的”⑧。但这并不是说要求每一篇小说都正面展开矛盾冲突，“而是说，不管你写什么，哪怕只是写家庭琐事，写心理活动，写一个瞬间镜头，写一种情绪意境，都应该有一种内在的而不是表面的矛盾隐含其中，让人们思而得之”⑨。

现实主义原则还要求作家忠实于生活，不断扩大艺术真实的领域。当有人对《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存妮和小豹子的性冲动提出指责时，雷达辩解说：这段描写是严肃的，不如此就不能深刻揭示“物质的贫乏和精神的荒芜的严酷的

现象”，“这是写出了个偶然，但这偶然反映了多么深刻的必然”。由此，他反过来批评有些人“总喜欢从主题制定的框框出发限制作品真实的领域”^⑩。他主张作家应该“广开题材，广开视野，不拘一格，不守一体”^⑪，生活是广阔的，现实主义的道路也应该是广阔的。他称赞张贤亮的小说能够“别人正写他反写，别人顺写他逆写，别人看正面他看背面，别人只看到痛苦”，他还看到了痛苦中的欢乐，伤痕中的美^⑫。所说的“反写”，乍一听好像有些怕人，但实际上正是指的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独特表现。这种对作家不从流俗，不赶浪头，敢于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反映现实的路子的独创精神的鼓励，贯穿在雷达所有的评论文章中，表现了他理论上的彻底性。

二

作为一个坚守现实主义理论阵地的年轻评论家，雷达对于当前创作中各种反现实主义倾向，总是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总是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在他的正面的评论文章中，都有一个或隐或现的理论对立面，这就形成了他评论文章鲜明的战斗特色。

在中国，长期以来现实主义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个是唯美主义，亦即形式主义的潮流；另一个是和极“左”思潮相联系的庸俗社会学所造成的公式化、概念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为思想特征的图解概念的文学受到了致命的一击，现实主义得到发展；但近年来唯美主义潮流又有乘机而起的趋势。社会主义文学是与现实、时代、人民密切结合，还是走进脱离尘寰的象牙之塔，经常尖锐地提到文艺创作和理论界面前。

早在1981年初雷达就尖锐指出，短篇创作中存在着“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正视现实中新的重大的矛盾冲突，触及千万人目前最关心的问题”的作品似乎少了一些，弱了一些，“就好像一部宏大的交响乐里，主旋律还不够嘹亮、清晰、有力一样”^⑬。在充分肯定我国文学创作的成就的同时，又割切地指出它业已露头的严重缺陷，体现批评家敏锐的眼力和批评勇气。从1982年下半年以来，雷达更进一步对于文学创作中以逃避现实为特征，以唯美主义为圭臬的侏儒式的“现实主义”进行了猛烈的冲刺：

大约从1981年以来至今，人们发现，面对如麻的现实矛盾，不少人对描写“四化”斗争的题材望而却步了；有的人写“伤痕加爱情”的故事写顺了手，当现实生活向文学创作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的时候，就有点手足无措了……创作中回避现实斗争、回避重大社会矛盾的倾向有所抬头了。^⑭

……在某些作品中，又冒出了另一种苗头：尽量绕开真实的生活矛盾，然后



大写所谓“心灵美”。由于所表现的多是琐碎的“好人好事”，并不能够触及实质性的矛盾，这类“心灵美”往往显得抽象、空洞、虚浮^⑤。

如果你是一个关心当前小说创作现状的人，你就不能不为这些直言快语而叫好，并且感到这不仅是坚持一种文学信念，而且是在代表读者说话。——这些读者可能只能表现出对某种文学潮流的冷漠，但评论家却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针对“我国文艺各领域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艺术形式上”的论调，他尖锐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当前创作继续突破的‘焦点’，一直集中在艺术真实的广度能不能扩大，艺术真实的程度能不能继续加深上。也就是说，是否允许更广阔、更尖锐的社会矛盾，‘在现实主义的领域中占有自己的地位’……这是政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学的思想解放运动所必须面临的严峻问题”^⑥中国文学要发展，就需要将近年的现实主义的启蒙运动继续进行下去，更需要这样大声疾呼的理论界战士。

革命现实主义和过去的批判现实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作家的世界观。当今的文坛上，既有人在理论上模糊革命现实主义和其他各种主义的区别界碑，否定他们有各不相同的哲学基础和社会条件，又有人在创作实践中轻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作用，盲目搬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雷达在自己的评论中，一贯重视作家的工作态度、是非爱憎和世界观的作用。在关于蒋濮小说的评论中，他批评作家将自己的同情、惋惜给了热衷“向上爬”，进行个人“复仇”的个人主义者。他指出，要表现今天的现实，批判现实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都是不行的。其所以不行，就因为他们或者认为社会是荒谬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冷酷的，否定得彻底，却并不肯定什么；或者肯定了不该肯定的东西，用这些思想指导创作，只能导致创作的歧途。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学却应该有美的、促人向上的力量，将生活的方向展示给读者。这并不是要离开作品的艺术构思，硬添加一个正面形象，而应该从作者对生活的态度和艺术评价中流露出来，渗透在对具体人物关系的描绘之中。只要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是积极向上的，什么样的人物的题材都可能具有一种人生的热气。他称赞邓友梅的市井小说“一扫旧日市井小说的陈腐观念和封建思想”，“对人物既倾注了感情，又绝不与他们站在同一的水准线上”^⑦。

三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

关系的总和。”^⑩坚持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正视现实,也就是正视人。所以所谓“社会问题小说”与“人物”小说在文学的意义上是统一的、不矛盾的。人在小说创作中的地位和意义,如何写好人,一直是雷达评论文章的议论中心。

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在整个感性世界里,人是最高级的存在物,所以人的性格是我们所能感觉到世界上最高的美。至于世界上其他各级存在物只有按照它们昭示到人或令人想到人的程度,才或多或少地获得美的价值。”^⑪可以说,人的感情世界,人的性格就是美;写人,就是写性格,人与性格在美学上应是一个同义语。写好各色各样的人,既是文学反映现实的手段,又是借以对读者进行高尚思想、美好情操教育的手段。针对认为小说可以只写一种情绪的说法,雷达认为“以塑造人物为主、塑造性格为主”,是不应该废弃的。“因为它道出了文学的最基本的原理。除非人类社会不存在了,这一条原理才会失效”。短篇小说有时是可以只写出一种情绪,“但也必须是人的典型情绪”^⑫。多年来,在我们的理论批评界,确实存在着对人的性格的片面理解,他们不是把人的性格当做人的全部稳定本质和心理感情体现,而仅仅看做脾气、爱好、长相等外在行为特征。这些外在特征也可能表现本质,因之成为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因素之一。但性格却主要不是表现在外在行为上,而是在人与人关系中所体现的独特的思想、感情、道德观、人生观等等。雷达引用黑格尔所说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对那种将性格抽象化、简单化、表面化的创作倾向深加针砭。

“人是很复杂的”,这是高尔基的话,雷达多次引用过,并发挥道:“社会生活是复杂的,丰富的,人的精神世界也应该是复杂的,丰富的。可以说,社会,有多复杂,人就有多复杂”^⑬。因此,我们的作家应该立足于探索人物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广阔性、复杂性,描绘更广阔的心灵世界。不光是转变人物心灵是复杂的,反面人物也是复杂的,正面人物,以至无产阶级英雄和杰出的领袖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应该是多面与主导的统一、复杂与单纯的和谐。雷达以孙健忠《甜甜的刺莓》中的毕兰大婶为例。毕兰大婶本来属于那种刚强、决断的女性,可是作者并没有让她“事事有决断,处处都刚强”,当听到爱女被品质恶劣的布谷寨党支书占有时,“她浑身瘫软,没有一点力”,并且默认了这件与自己的道德观念、思想感情格格不入的事。在详细引述毕兰大婶矛盾感情的描写后,评论家忍不住称赞:“这是一场感情的风暴,内心的风暴!……她能指挥一个大队,她敢抵制双季稻,她可以承受各种命运的打击,她却管不住,也管不了自己的爱女!仅此一个情节,可以看出作家找到了生活的内在矛盾、人物个性中的内在矛盾,同



时也就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②

多年来“左”的思潮给创作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将人物的性格等同于人物的阶级性,等同于政治态度。“许多人物,只分为黑、白、红几种色的。人物的脸上打着‘黑痣’,一眼就可看穿了他的‘本质’。至于‘正面’‘反面’‘中间’等人物的分类,也远远不能概括现实中人物的复杂性。”^③而《芙蓉镇》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作者没有把他的人物当做某种概念和思想的化身,而是作为活人来写的。即使对某种政治力量的代表性人物,也注意揭示出灵魂的复杂性。他多次指出创作理论界对恩格斯所说的“主要人物是—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这段话的机械理解,由于片面强调“代表”,以致把有着自己复杂感情的、有个性的人物,处理成为某种社会力量的传声筒,把人物关系的矛盾纳入到一个老套的政治主题中去,削弱了人物行为的真实的个人动机。其实,人物的动机,哪怕是阶级特征较强的动机,也是从作品中人物独特的个人行为和丰富的感情中袒露出来的。而单学鹏的《这里通向世界》好就好在写出了几种人物掩盖在高级政治术语背后的个人动机,揭示出这些人物心灵的波澜。因此他主张既可以从政治角度、思想斗争角度,也可以从伦理道德、婚姻爱情,以及事业、友谊、荣誉等等角度去表现人物的精神品质、道德情操。“不广泛开拓表现人的空间,就不可能再现人物广阔丰富的精神世界”。^④

雷达还从人物本身的外部表现形式与内心活动之间的矛盾统一方面探讨了人物复杂性问题,他认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内’与‘外’,是既矛盾又统一的。人与周围环境接触,便会引起内心的微妙变化,而内心的冲突又会从肖像表情中迅速地、曲折地表现出来。”人的内心世界,千变万化,一片小小的心田,可以折射出相当复杂的社会矛盾,“关键在于准确地把握人物心界受到外界刺激后的活动线索”。^⑤他认为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评论托尔斯泰小说时所说的“心灵的辩证法”。

雷达文学评论关于人物描写的另一个观点就是重视各种各样的人物在小说中的地位。首先,他呼唤我们的小说中有更多的新英雄人物。他衷心称赞英雄儿女的赞歌《西线无战事》是我国军事文学的一朵奇葩。他认为初步成功地塑造出具有复杂内涵的新人形象是近年来文学勃兴的主要表现,是作者们生活视野、艺术视野开阔的结果。同时,他又多次指出,描写新人形象几乎是多年来我们文学创作的薄弱环节。

我有个感觉,比起对文学作品中新人形象的提倡和探求,雷达似乎更关心是否允许各种人都能在我国文学中占有一个位置,关心“人”的形象的扩大。只要是在人与人的错综关系中,塑造的具有复杂生活内涵的真实性格,他都给予

较高的评价。蒋濮的小说《温暖的五月夜》中的苏梅是一个畸形的病态的人物，雷达认为这个人物仍然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因为作者通过这个复杂的性格，对已经消逝了的那个时期进行了社会解剖。这样的人物“介乎光明与黑暗两种力量之间”，她复杂的灵魂，是可以容纳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并折射出我们生活的一个侧影的”，“我们的文学是可以容许像苏梅式的人物在某一特定主题里作为主人公的”。^{②6}在《邓友梅的市井小说》一文中，他说，邓友梅小说中那些不大为人瞩目的市井人物，“大多经历过新旧时代，他们的心灵上既有旧意识的灰尘，也有新思想的印记，所包含的社会性很丰富；作家描写他们，往往能挖掘出比一般人物更深刻的社会意义”。^{②7}能给苏梅、那五这一类人物以这样高的美学、社会学的评价，显示出评论家的现实主义勇气。

四

典型化是现实主义文学最本质的特征之一，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作为一个更多关注于各个时期创作实际的文学评论家，雷达还未来得及从理论上更多地概括和研究，以致在理论表述上常有这样那样的不够精确之处。但是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上，他是十分注意作品的生活容量和艺术概括力的大小、人物的典型性的。他引用别林斯基的话，称赞《乡场上》等作品“在一瞬间集中了那么多的生活”，“通过一个小人物再现了一个大时代”。他指出：“《乡场上》没有停留在表面化地描写事件的过程上，而是紧紧抓住冯么爸的矛盾心理和精神状态，尽力挖掘内心矛盾后面潜藏的社会原因。揭露造成冯么爸精神状态的生活条件和各种因素，这就把艺术的触角从邻里纠纷中伸展开去，触及了农村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②8}他之所以几次写文章高度评价《芙蓉镇》，就是因为古华不单是写了几个人的命运遭遇，写出了一个小社会，一个生活整体，而且从“小社会”的旋转变幻，来透视大社会、大时代的旋转变幻：“他写的是小镇上的几家几户。隐现的是大时代的千家万户；他描绘的是小镇上的人生聚散，再现的是大世道的升沉浮降；他抒写的是生离死别、儿女情长，隐括的是家国兴衰，政治风云。在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概括的途径上，作者显示出很强的功力和不凡的魄力。”^{②9}

“要写人，最重要的途径要真实深刻地描绘出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与人物交融渗透在一起。”^{③0}这当然也不能算新见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环境和人物结合的论述，包含着一个重要的提法，这就是强调小说中人物性格的逻辑与社会生活的逻辑的统一。他认为人的性格是流动的、发展的，而这个发展不能不受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社会环境、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制约。“人离开他



人,人离开了具体环境,就成为抽象的躯壳,成为‘非人’”。^①他批评张贤亮的中篇小说《土牢情话》过多侧重于个人细腻感情的刻画,而没有把个人的悲欢与广阔的社会背景、社会力量联系起来,显得境界狭小。他尖锐批评那些热衷于探索“自我”的小天地,远离火热的现实斗争,使人物成为没有背景、没有环境、没有来龙去脉的超历史、超时代、超社会的抽象物的创作倾向。

雷达关于人物与环境的结合的观点还表现在他对当前小说创作典型化程度不高、典型太少的某些原因的看法上。在关于韩石山小说的评论中,雷达提出:“他笔下的人物虽有鲜明的特征,但这些性格特征往往停在表面,不饱满,不丰厚,典型化的程度不高”,除了生活积累不足这个原因外,“没有从更广阔的背景上,更典型的环境中来多方面地刻画人物”^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创作上正反的事实都说明,真实、具体、典型的社会环境在提高人物典型性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成为形成、产生艺术个性的直接原因,增强形象的立体感和历史感,环境和性格的有机结合还可以使偶然、意外、特殊、怪诞的性格显得合理可信。只追求形象的鲜明、生动,而不善于在更典型的环境中体现出形象更大的意义,不仅是韩石山,也是当前许多中青年作家创作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所以雷达对于韩石山创作缺陷的这一批评中,不仅包含着理论的开拓,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雷达关于典型化的小说评论,不仅重视人物、环境的生活概括力,还扩充到对作品情节、细节、具体画面的生活概括力的分析、评论上。他称赞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的结尾画出了一幅“高原游子回归图”:“画面是这般的小,容量是这般的大。”^③同样,对于情节,他喜欢的是“有力量的情节,有心理容量的情节,有诗情的情节”,而不赞成刻意追求情节的“奇异,曲折、引人入胜”。^④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不过写了一个普通农民的一次最普通的进城,再平淡不过了,但却包含着多么深厚的内容。他把这种虽然平淡无奇,但内涵却极不平常的情节称为“平中见奇”的情节,这是很难得的功夫。另外,某些小说情节奇特,同样可以刻画出真实可信的性格,反映出深刻的社会内容,对这种“奇中见平”的情节也不应鄙薄。综观雷达关于小说创作的全部评论,他推崇的都是那些深度和容量较大的作品,非薄那些以“自我表现”始,又以“表现自我”的一点狭隘渺小的意识为终结的小说。他说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从爱情问题发现的是根本的社会问题,在深度和容量上对短篇创作有很强的借鉴价值,由于作者对生活的理解是深刻的,作品在字里行间“出现了一股渗透力”,即使是那些不为人所注意的细节。所谓“渗透力”,正是对作品的情节、细节、形象、思想在读者心理上所造成的感知、理解、想象、联想效果的形象概括。